

# 《赫兹列散文精选》的文化互文性研究

王中伟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6日

## 摘要

研究以互文性理论为框架, 以潘文国翻译的《赫兹列散文精选》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英文原作与汉语译本之间的文化互文关系。文章从“作者”“读者”和“批评家”三个角度, 分别对应互文性表现的“改写”“完成”和“阐释”, 以《人生众相录》为例, 从哲学思想与精神文化层面剖析了散文在跨文化语境下的意义重构。研究认为, 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 而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文化对话与再创造过程, 潘文国的译本通过与中国文化语境的互文互动, 使赫兹列的思想获得了新的表达与意义。

## 关键词

互文性, 赫兹列, 跨文化

## A Study on Cultural Intertextuality in *Selected Essays of William Hazlitt*

Zhongwei W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Received: May 6, 2026; accepted: June 4, 2026; published: June 16, 2026

##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intertextuality theory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focuses on Pan Wenguo'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Essays of William Hazlitt*, exploring the cultur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glish original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author", the "reader", and the "critic", the study examines three forms of intertextuality: "rewriting", "completion", and "interpretation". Using *Characteristics* as a case study,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the essay with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spiritual culture. The study argues that translation is not merely a process of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 but rather a dynamic and multi-layered process of cultural dialogue and recreation.

文章引用: 王中伟. 《赫兹列散文精选》的文化互文性研究[J].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3): 322-328.

DOI: 10.12677/wls.2026.143045

**Through intertextual interaction with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Pan Wenguo's translation enables William Hazlitt's ideas to acquire new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 Keywords

**Intertextuality, Hazlitt, Cross-Cul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威廉·赫兹列(William Hazlitt)是英国著名的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和画家,被誉为浪漫主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的一生经历了动荡,这些社会变革对赫兹列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作品风格独特,语言生动,思想深刻,常以个人情感和主观视角切入,打破了当时文学批评的刻板模式,以犀利的文风、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情感著称,对19世纪英国文学和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潘文国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尤其以翻译西方文学、哲学以及文化经典作品而闻名。他的翻译作品涉及范围广泛,从文学到哲学、历史等领域,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潘文国不仅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还在翻译过程中注重文化的传递与再现,力求将原作的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传递给中国读者。

许钧(2009: 124) [1]指出:“译者作为一个特殊的读者,其最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融合成一个更大的视界,让翻译涉及的诸视界达到贯通融合,亦即最终完成沟通与交流之重任。”在翻译过程中,潘文国不仅关注语言的精确转换,还注重文化的再现与传递,力求赫兹列的社会批判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得到准确的呈现。潘文国(2011: viii) [2]提到:“赫兹列散文包罗的范围很广,有政论、有文论、有戏剧和舞台演出评论,还有哲理性的著作。但他写得最成功的、也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的随笔或称杂志体散文”。赫兹列的散文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的写作风格直接、犀利,通常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作品常常涉及以下几个主题:首先是个体主义与自由,赫兹列的散文中充满了对个人自由与自我表达的强烈推崇。其次是文学与艺术批评,赫兹列以其独特的文学眼光对当时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具有强烈的个性与思想性,既表达了他对文学艺术的深刻理解,又展示了他对文学审美和文化传统的独立思考。最后是社会批评与政治洞察,赫兹列不仅在艺术和文学上有所建树,他的社会批评也十分尖锐,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赫兹列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有着深刻的批评。

《赫兹列散文精选》被译者潘文国分为三个部分:人生·杂感,文学·艺术,治学·休闲。潘文国(2011: ix) [2]指出:“分成三辑,完全是出于译者的任意性。但就是这些文章,也表现了赫兹列风格的多样性。他所追求的也是一种‘没有个性’的风格。就像演员一样,穿上各色服装,就成了各种人物。”潘文国在翻译过程中,坚持忠实与通顺并重,力求在忠实于原作思想的同时,考虑到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使得译文既准确又生动。他的翻译不仅限于语言层面的传递,更注重对原作精神的再现和文化内涵的表达。比如,“赫兹列好用典,好用对偶排比,特别爱用警句体。他的《人生众相录》全书以语录体写成,尤富警句,读来有读《论语》的感觉,因此本书也以《论语》体译之”(潘文国, 2011: ix) [2]。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称文本间性,是语篇特征之一,指“两个或多个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章玉芳, 2020: 55) [3],它强调文本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互文性理论最初由朱丽娅·克里斯蒂

娃在吸收巴赫金对话理论与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后来，罗兰·巴尔特将互文性推向读者中心论，提出“作者之死”。结构主义视角下的互文性强调文本之间稳定的引用、模仿与继承关系，而后结构主义则更强调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与无限延异，认为任何文本都处于不断生成的意义网络之中。本文主要采用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互文性观念，将文本视为开放性的文化交流场域，将翻译视为一种动态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从而更适用于分析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转换与意义再创造。

文化互文性(cultural intertextuality)则是在互文性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强调不同文化文本、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关注语言层面的引用与改写，更重视文化意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构与生成。本文所讨论的文化互文性，主要指译本在翻译过程中与目标语文化形成的文化关联、意义对话与精神重构。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互文性与文化过滤、归化、异化等翻译概念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文化过滤强调译者根据目标语文化习惯对原文信息进行调整与筛选；归化则更强调译文向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的靠近；而异化则强调保留原作的语言特征与文化陌生感，使读者意识到文本的异域文化属性。而文化互文性并不局限于翻译策略层面的语言调整，而是关注译本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与目标文化形成新的意义关联与文化对话。

从不同角度出發，互文性的表現不同。首先，從作家角度來看，互文性表現為對文本的改寫，任何作者在寫作時都是在對別的文本文本進行有意或無意的改寫(殷企平，1994: 40) [4]，有意識的改寫包括詮注、翻譯、典故的運用和反諷模仿等，另一種是作者對先前作品的無意識的改寫；其次，從讀者的角度看，互文性又表現為“文本的完成”(殷企平，1994: 42) [4]；最後，從批評家的角度看，互文性還表現為文本的闡釋(殷企平，1994: 44) [4]。

而潘文國翻譯的《赫茲列散文精選》完全可以用互文性理論來分析，原因如下：首先，從作家的角度，赫茲列的散文集有些內容是他對早期文學回應與改寫。例如，赫茲列在其散文中對莎士比亞等作家及其作品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解讀，他的作品充滿了對這些經典的詮注與重述。同樣，潘文國在翻譯赫茲列的散文時，作為翻譯者，他並非簡單地將赫茲列的思想直接轉化為中文，而是在翻譯的過程中進行了一定的改寫和再創造。他不僅要傳達赫茲列的原文含義，還將其中的文化背景和哲學思想重新構建，使之更貼近中國讀者的文化認知。

其次，從讀者的角度，文本的意義並非固定，而是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中得到完善。潘文國翻譯的《赫茲列散文精選》為中文讀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解讀和理解赫茲列思想的途徑，其不僅僅是字面意義的傳遞，更是一個跨文化的對話。

最後，從批評家的角度，翻譯過程本身就是一種闡釋，潘文國作為翻譯者，其翻譯《赫茲列散文精選》實際上就是對赫茲列文本的深度闡釋以及再創造。他不僅是語言的轉換者，更是文化的解釋者和思想的傳播者。

由此，本文以互文性理論為依托，從作者、讀者和批評家三個角度，分別對應互文性表現的改寫、完成和闡釋，以《人生眾相錄》為例，從哲學思想與精神文化層面剖析散文在跨文化語境下的意義重构。

## 2. 哲學與思想的文化互文性轉換

《赫茲列散文精選》的第一部分為人生·雜感，描寫了一些與哲學與思想有關的內容，如人生、隨筆、過去與未來、小大之事等，本篇論文選擇《人生眾相錄》中的片段並從作者、讀者、批評家的角度介紹其中的文化互文性轉換。

### 2.1. 哲學與思想的“改寫”

首先，《人生眾相錄》第一句提到：“此書之作，仿羅切福考爾之《格言與德行斷想錄》所為也。”(潘

文国, 2011: 3) [2]。在这段文字中, 赫兹列明确提到这本书是受到罗切福考尔(La Rochefoucauld)的《格言与德行断想录(*Maxims and Moral Reflections*)》的启发, 表达自己在罗切福考尔的作品中发现的“文风”和“内容”的魅力, 这直接体现了对罗切福考尔作品的文学借鉴, 赫兹列的写作不仅是在借鉴罗切福考尔的结构和方式, 也是在原有格言体传统基础上进行了个人化表达与思想重构。赫兹列的这种借鉴不仅是对文体的模仿, 也体现了文化间的相互影响。罗切福考尔的法国启蒙思想与赫兹列的英国浪漫主义思想在语言形式上和结构上进行对话, 展现了跨文化的文学互文性。

此外, 在这段翻译文本中, 潘文国在汉译过程中也进行了文化上的改写与再创造。他通过语言表达了赫兹列的写作动机, 并将这种影响以中国文化背景的方式呈现。潘文国(2011: ix-x) [2]说: “我用文言试译了三个整篇。其中《人生众相录》因为是语录警句体, 看来比用白话译效果要好。”并且“他又好用典, 好用对偶排比, 特别爱用警句体(他的《人生众相录》全书以语录体写成, 尤富警句, 读来有读《论语》的感觉, 因此本书也以《论语》体译之)。”这些副文本内容表明, 潘文国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借用了中国古典语录体的语言形式, 从而使译文更容易与中国读者已有的文化阅读经验形成联系。

在哲学与思想层面, 潘文国(2011: ix) [2]说: “他的散文风格总的趋向是阳刚一路, 以中国古代散文作比, 像孟子, 像韩非, 像司马迁, 像韩愈……”因此, 赫兹列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与中国传统思想有了联系。例如, 在 27 则格言中, 潘文国(2011: 2-3) [2]将: “Those who are the most distrustful of themselves, are the most envious of others; as the most weak and cowardly are the most revengeful”译为: “自疑者必好妒人, 自怯者必好犯人。”这和《论语》中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结构形式相似。赫兹列认为那些对自己缺乏信心和怀疑的人, 往往会表现出极强的嫉妒心理。这一分析实际上回应了古典哲学中关于人际关系的讨论。例如, 廖申白(2003: 35) [5]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道德德性”, 从中可以得出: “嫉妒是一种不合理的情感, 它源自个体对他人超越自我的恐惧与不安。”赫兹列则进一步将“嫉妒”与“自我怀疑”联系起来, 从个体心理层面对这一情感进行了重新阐释。同时, 潘文国采用“自疑者”“自怯者”等结构以及“……者……”的文言表达方式, 使译文呈现出明显的中国古典格言色彩, 从而在译文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之间形成一种文化互文关系。

这种文化互文关系更多体现为译文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接受契合。例如,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 儒家强调自省与个人修养, 道家则重视内心的平和与节制, 如心如止水。在儒家思想中, 自省是修身齐家的基础, 强调个人应当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内心, 以达到内在的和谐与道德的完善。然而, 儒家同样警惕过度的自我怀疑, 因为这可能导致个人对他人的成功产生嫉妒和负面的情绪。君子应当有广阔的胸怀, 容得下不同的见解与人群, 而不是因为他人的优点和成就感到嫉妒。赫兹列关于自我怀疑容易引发嫉妒的观点,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内在心理平衡的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思想契合点。此外, 儒家的君子之道反对个人过度的自我怀疑, 提倡的是自信和自尊, 要自身博学多识, 不要嫉妒别人的才能, 避免因内心的不安而对他人产生嫉妒。赫兹列强调自我怀疑与嫉妒的内在关联, 他的这一思考可以与儒家的内修相结合, 提醒人们在培养内在自信和稳定心态的过程中, 避免产生对他人优点的负面情感。

在第 59 则格言中, 潘文国(2011: 2-3) [2]将: “Silence is one great art of conversation”译为: “沉默者, 言谈之良方也。”他强调沉默作为交际中的一种艺术, 不是愚昧或无知的表现, 而是一种智慧的体现。这与道家思想中的“无为”以及中国思想中的“沉默是金”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 在道家哲学中, 无为并不是完全的不作为, 而是指顺应自然、避免过度干预。在言语上, 无为即是“识时而默”, 即根据环境和时机选择适当的沉默, 避免多余的言语和冲突。这不仅保留了原文关于“沉默”的哲理意味, 也在语言形式和文化联想层面与中国传统格言文化形成了互文关联。此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沉默是金”“口是祸门”“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言简意赅”这些成语或者格言, 潘文国通过翻译这一思想为“沉默者, 言谈之良方也”, 其在东西方文化中形成对“沉默”意义的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若采用偏向保留原文句法结构的直译方式，其可以译为：沉默是谈话中的一种重要艺术。这种译法更加接近原文的语义结构，保留了英语中的抽象概念特征，更强调“沉默”作为一种交谈技巧的意义。然而，潘文国则将其译为“沉默者，言谈之良方也”，不仅采用了“……者，……也”的中国古典判断句式，还以“良方”替代原文中的“art”。相比“艺术”这一偏中性的表达，“良方”更带有经验性、训诫性与处世智慧意味，使译文呈现出浓厚的中国古典格言色彩。

由此可见，赫兹列的这些格言虽然源于西方思想传统，但经过潘文国带有古典语录色彩的翻译后，译文在中文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生成空间。从互文性中的“改写”角度来看，潘文国的翻译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哲学和思想问题的改写与再创作。他的这些理解与儒家和道家思想、以及中国的传统思想不谋而合。

## 2.2. 哲学与思想的“完成”

张德明(2004: 126) [6]提到：“通过书本和阅读行为，作者的观念、感觉、梦幻和生活方式被保存和激活了。读者以一种真实而直接的方式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事实上使文本超越了物质和时间的障碍。”

读者对《人生众相录》的理解会受到译文语言形式与自身文化经验的共同影响。在第1句格言中，潘文国(2011: 2-3) [2]将“Of all virtues, magnanimity is the rarest. There are a hundred persons of merit for one who willingly acknowledges it in another.”翻译为：“诸善之中，容人最难。己善而称人善者，百不有一焉。”其中，“诸善”“容人”“百不有一焉”等表达具有明显的文言色彩，容易使中文读者联想到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宽容、谦让等价值观念。尤其“容人最难”这一表达，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君子之德与宽以待人等伦理观念之间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文化接受契合。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译文中的这种文言化表达不仅传达了赫兹列原文关于宽容的哲理思考，也使中文读者更容易将其纳入自身熟悉的文化理解框架之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会主动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容人之量、成人之美等道德观念，从而进一步完成文本意义在中文语境中的生成与扩展。

此外，在第145则格言中，潘文国(2011: 4-5) [2]将：“Honesty is one part of eloquence. We persuade others by being in earnest ourselves.”译为：“辩以信立，人以诚服。”其在翻译时采用了四字结构与文言化表达，使译文呈现出浓厚的中国古典格言色彩。读者在阅读这条格言时，会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理解来解读“信”与“诚”的意思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读者可能会想到，在实际的生活和交流中，诚实是赢得他人信任和说服他人的关键因素。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看，文本意义并不是固定存在的，而是在读者阅读过程中不断被补充与“完成”的。在英语文化背景下，读者可能会联想到著名的演讲家、作家和哲学家们的观点，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他们都强调了诚实 in 辩论和说服中的重要性。而在中文文化语境中，“信”与“诚”等词汇则容易激发读者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文化联想例如，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强调“诚信”在人际关系与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言必信，行必果”等观念早已成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文化表达。

如果采用偏向直译的方式，其可译为：诚实是雄辩的一部分。我们通过自己的真诚来说服别人。这种译法能够较为完整地保留原文的逻辑结构与语义信息。而潘文国将其译为“辩以信立，人以诚服”，则采用了四字结构与对偶化表达，使译文呈现出明显的中国古典格言特征。其中，“信”与“诚”不仅对应原文中的“honesty”与“earnest”，也容易激发中文读者对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诚信”观念的联想。相比直译版本偏重概念传达，潘文国的译文更强调语言的凝练性与伦理意味，使中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容易将其纳入自身熟悉的文化经验与价值体系之中，从而进一步体现出互文性理论中文本意义在阅读中不断被“完成”的特点。

这些观念成功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观念对接，这些内容不仅保留了赫兹列原文的哲理内涵，也让中文读者能够通过文化的桥梁，理解和反思诚实与真诚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

这种“完成”并非文本原义的简单再现，而是读者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对译文进行再理解与再阐释的过程。潘文国的翻译不仅实现了语言层面的转换，也通过中国古典语录体的语言形式，为中文读者提供了新的文化接受空间，从而体现了互文性理论中文本意义由阅读共同生成的特点。这正是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文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完成的过程。

### 2.3. 哲学与思想的“阐释”

“阐释”分为两个方面：“理解”和“解释”。张德明(2004: 130) [6]提到：“解释的对象不是作者的意识而是文本的意义。加达默尔认为：理解并不是一种复制的过程，而是一种创造的过程。”

在第 23 句中，潘文国(2011: 2-3) [2]将“*Envy is a littleness of soul, which cannot see beyond a certain point, and if it does not occupy the whole space, feels itself excluded*”翻译为：“妒者器小而视迹，凡有所求，非全必怨。”从批评家的角度来看，潘文国并没有拘泥于原文的字面对应，而是通过“器小”“视迹”“必怨”等带有文言色彩的表达，对赫兹列关于“嫉妒心理”的论述进行了具有中国古典语言特征的阐释。其中，“器小”不仅对应原文中的“*littleness of soul*”，也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器量狭小”的伦理意味；“视迹”则进一步强化了“目光短浅”的批评意味。这种翻译方式不仅传达了原文对嫉妒心理的哲学思考，也通过古典格言式表达增强了译文的警示性与训诫意味。

在第 178 则格言中，潘文国(2011: 6-7) [2]将：“*We easily convert our own vices into virtues, the virtues of others into vices*”译为：“己之恶则视为善，人之善则视为恶，此易犯之病也。”从批评家的角度来看，赫兹列的这一格言提出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主观性偏见”。潘文国在翻译“*easily*”时并没有单纯翻译成“容易地”，而是转化为“此易犯之病也”，这是对原文的一种理解和阐释，是为了让句子的意思更清楚和有警示作用。原文说的是人们常常把自己的缺点当作优点，把别人的优点看成缺点，而“易犯之病”用来强调这种行为很常见，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这种偏见。中文里，“病”不仅指生理上的疾病，还常用来形容人的缺点或不对的行为，带有一种警告的意思。加上“易犯之病也”，让这句话听起来更有道理，提醒读者这种心理很普遍，需要反思和改正。

若采用偏向直译的表达方式，其可译为：我们总是很容易把自己的恶行看成优点，而把别人的优点看成恶行。这种译法较为忠实于原文语义，能够直接呈现赫兹列对于人性偏见的观察，但整体表达相对平实，更偏重心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而潘文国的翻译不仅采用了文言句式，还进一步增加了“此易犯之病也”这一原文中并未直接出现的表达。从阐释学角度来看，这种处理实际上是译者对原文意义的进一步强化。“病”字在中文文化语境中不仅具有缺陷、弊端之意，还带有明显的警示与道德批评意味，使译文呈现出更强的训诫性与反思色彩。相比直译版本偏向陈述，潘文国的译文则更强调对读者的劝诫作用，这种带有文化阐释色彩的语言重构，也进一步体现了翻译并非机械复制原文，而是译者基于目标语文化进行意义再生成的过程。

因此，这种翻译不仅保留了赫兹列对于人性自我中心倾向的观察，也通过中国成语化表达增强了译文在中文语境中的文化熟悉感。从阐释学角度来看，潘文国并非机械复制原文意义，而是在理解赫兹列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语言文化中的表达习惯，对文本进行了重新组织与意义重构。由此可见，潘文国在翻译《人生众相录》时，不仅重视原文思想内容的传达，也通过文言化、格言化以及成语化的方式，使译文在中文文化语境中形成新的意义生成空间。这种阐释过程体现了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对应，而是一种基于文化理解与语言重构的再创造过程。

## 3. 总结

本篇论文以互文性理论为框架，分别从作者、读者、批评者的角度分析了《人生众相录》中的片段，

体现在作家的改写、读者的完成以及批评家的阐释。赫兹列的散文深受前人影响，如对罗切福考尔等作家的回应与改写。潘文国在翻译过程中，也对文本进行了文化转换，使其更符合中文读者的理解，这体现了翻译的互文性。潘文国对赫兹列散文的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对原文思想的阐释。他的翻译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通过精准的词汇选择，使得赫兹列的思想在跨文化语境中仍然能够保持其深刻性，同时增强了文本对目标读者的可理解性和影响力。此外，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赫兹列的哲理与自身文化经验相结合，使其思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得到完成。翻译者和批评家对文本进行理解和解释，忠实于原文，更加强了警示作用。

总体而言，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文化对话与再创造过程，潘文国的译本通过与中国文化语境的互文互动，使赫兹列的思想获得了新的表达与意义。通过互文性理论可以深入分析《赫兹列散文精选》在不同语境和文化中的再现与转化，揭示文本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丰富层次。

### 参考文献

- [1] 许钧. 翻译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2] 赫兹列. 赫兹列散文精选[M]. 潘文国, 译, 王宏印, 评点.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3] 章玉芳. 互文性阅读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 基础教育课程, 2020(2): 54-59.
- [4] 殷企平. 谈“互文性” [J]. 外国文学评论, 1994(2): 39-46.
- [5]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6] 张德明. 批判的视野[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